

中 华 文 史 新 刊

朝鲜朝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

——以《燕行录》《朝天录》为中心



徐
东
日
著

本书通过对朝鲜朝使臣“使华录”作品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具体考察了朝鲜士大夫看待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特殊视角、价值取向以及朝鲜民族对中国的总体想象，系统阐明了这些游记与当时朝鲜人对中国的“社会总体想象”之间的互动关系，较为清晰地勾勒出朝鲜朝使臣眼中的明代、清代的 中国形象以及在朝鲜朝语境下中国形象的嬗变轨迹，进一步透视朝鲜民族的社会文化心理，挖掘构成这些形象背后的社会深层的文化意蕴。

中 华 书 局

中 华 文 史 新 刊

朝鲜朝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

——以《燕行录》《朝天录》为中心

徐东日 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朝鲜朝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 / 徐东日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12

ISBN 978 - 7 - 101 - 07758 - 2

I. 朝… II. 徐… III. 中朝关系 — 国际关系史 —
研究—明清时代 IV. D829.3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0)第 238013 号

书 名 朝鲜朝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

著 者 徐东日

丛 书 名 中华文史新刊

责任编辑 刘彦捷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630 × 960 毫米 1/16

印张 19½ 插页 2 字数 370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7758 - 2

定 价 49.00 元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朝鲜朝使臣的入华使行活动	7
第一节 朝鲜朝对明、清两朝的朝贡	7
第二节 朝鲜朝使团的概况	10
第三节 朝鲜朝使团的使行路线及馆所	16
第四节 朝鲜朝“使华录”的作者	23
第二章 朝鲜朝使臣笔下的明代中国形象概说	33
第一节 朝鲜朝与明朝的关系	33
第二节 明代朝鲜朝使臣笔下繁荣、进步的中国形象	42
第三节 朝鲜朝使臣笔下灰暗的中国形象	54
第三章 17 世纪下半叶的清朝形象	
——以麟坪大君的《燕途纪行》为中心	60
第一节 17 世纪下半叶朝鲜朝与清朝的关系	60
第二节 满族人:妖魔化的人物形象	65
第三节 顺治帝:具有争议的清帝形象	79
第四节 紫禁城形象:朝鲜朝使臣慕华心态的投射物	96
第四章 18 世纪上半叶的清朝形象	
——以金昌业的《老稼斋燕行日记》为中心	114
第一节 18 世纪上半叶朝鲜朝与清朝的关系	114
第二节 毁誉参半的满族人	119
第三节 康熙帝:从“妖魔化”向“理想化”迁移的君主形象	134

第四节	复杂的人物形象:文明程度高但缺乏气节的汉族人	150
第五章 18 世纪下半叶的清朝形象		
——	以北学派人士的“燕行”作品为中心	166
第一节	18 世纪下半叶朝鲜朝与清朝的关系	166
第二节	民俗蠢强、专尚弓马的满族人	170
第三节	乾隆皇帝:较客观、理想的皇帝形象	191
第四节	基本正面的汉族士人:学识渊博、姿貌雅洁、重情重义	204
第五节	理想的中国社会:经济繁荣与利用厚生	216
第六章 结 论		
第一节	朝鲜朝对中国的社会总体想象及其中国形象的嬗变	247
第二节	“使华录”作者与朝鲜朝对中国的社会总体想象	250
第三节	“使华录”作品中中国形象发生嬗变的原因	255
第四节	“使华录”作者塑造中国形象的学理价值	257
主要参考文献		
附 录		
	韩国所藏“燕行录”作品	269
	朝鲜历代燕行使臣一览表	281
后 记		

导 论

一 “使华录”的内涵及其研究价值

“使华录”是指在中国的元、明、清三个朝代(历时 700 多年)来到中国京城的朝鲜使臣将其在华期间的见闻、感悟自由地有创意地记录下来的一系列使行作品的总称(约有 500 多种)^①,它具有体裁多样、作者层次多、年代跨度大等特点。其体裁有日记、诗歌、杂录、小说等,内容包括中国当时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教育、科技、民俗、建筑、宗教、方言、文学艺术、社会心态等诸多文化因素,从自然流程、器物流程、社会流程、意识流程等诸方面对当时中国特定区域的特定文化内涵进行了比较翔实的记述。

“使华录”由于是外国人对中国认识的第一手资料,所以具有直笔和完整的优点,其中提供的大量生动、有趣的珍稀史料,未见于同时代的中国史籍,也比朝鲜王朝官方编撰的《李朝实录》中对中国记载的部分更具有资料的原始性,在很多方面弥补了明代与清代中国史料的不足,具有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

“使华录”作为高丽朝与朝鲜朝派往中国京城的使臣留下的旅行记录,其文本在描述或塑造异国形象时由于双方文化的差异会出现“失真”的现象,即它更多是想象与“误读”的产物。而这种“幻像”的形成却正是形象学力图探讨的重点,所以,“使华录”是我们运用“比

^①需要说明的是,元代的《宾王录》(李承休撰)只有一部,可以忽略不计。由于清代的使华作品比明代的多几倍,再加上在明代也有三部冠名为《燕行录》的使华作品,所以,人们往往把使行中国所撰写的“使行作品”统称为《燕行录》。但在本文中,因为要论及明代和清代的“使华”作品,所以以“使华录”指称所论及的全部文本。

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文学研究的珍贵文本^①。我们通过对不同的文化因子(人物、风俗、建筑、市肆、器物等)对朝鲜朝的“使华录”作品进行跨学科的系统研究^②,通过系统地阐明这些游记与当时朝鲜人对中国的“社会总体想象”之间的互动关系^③,同时通过研究文本作者如何在其文本中理解、描述、塑造作为“他者”的满族与汉族的形象,可以较为清晰地勾勒出朝鲜朝使臣眼中明代、清代的中国“形象”以及在朝鲜朝语境下中国形象的嬗变轨迹^④。与此同时,可以做到具体考察朝鲜士大夫看待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特殊视角、价值取向以及朝鲜民族对中国的总体想象,同时进一步透视作为满族、汉族形象创造者的朝鲜民族的社会文化心理,挖掘这些形象背后的深层文化意蕴。

二 “使华录”的版本

其实,以上笔者所说的“使华录”只是一个广义的统称,“使华录”实际上包括《燕行录》、《朝天录》、《宾王录》(目前所见只有一部作品)三种,其中,《宾王录》是指描述高丽朝使臣在元大都等地各种见闻的使行作品,《朝天录》主要是指描述朝鲜朝(或高丽朝)使臣在明王朝各种见闻的使行作品,《燕行录》则主要是指描述朝鲜朝使臣入燕(清朝)途中各种见闻的使行作品^⑤。

据笔者掌握的信息,“使华录”有如下几种结集的版本:第一种为韩国首尔大学编撰的12卷本的《燕行录选集》(韩国成均馆大学出版

①比较文学形象学所研究的,“是在一国文学中对‘异国’形象的塑造或描述”。

转引自孟华的《比较文学形象学论文翻译、研究札记》,载孟华主编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第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②严格地说,“使华录”也包括元代来到中国京城的朝鲜使臣李承休的《宾王录》,但因为只有一篇,所以在本著述中略去不论。

③作家所在国家的整个社会对某一异国的集体阐释,就是社会总体想象。参阅孟华的《比较文学形象学论文翻译、研究札记》,载于孟华主编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第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④“比较文学形象学所研究的一切形象,都是三重意义上的某个形象:它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的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转引自孟华所著的《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载于孟华主编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第2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⑤燕即燕京,指清朝的都城北京。

社与大东文化研究院出版社出版,1962年);第二种为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编撰的12卷本的《国译燕行录选集》(韩国国民文库出版,1967年);第三种为编者不详的4卷本的《朝天录》(台湾珪庭出版社出版,1978年);第四种为韩国林基中编撰的100卷的《燕行录全集》(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社出版,2001年);第五种为韩国的林基中与日本的夫马进共同编撰的《日本所藏篇·燕行录全集》(韩国东国大学韩国文学研究所出版,2001年)。此外,还散存着大量的单行本或附行本。对于“全集”中“使华录”作品的传承情况,林基中先生在他后来所著的《燕行录研究》一书中,按照时间顺序做了详细的罗列(包括已确认的韩国与日本的“燕行录”藏本以及韩国尚未收集的“燕行录”作品),笔者将附录在本书后面,在此不再赘述。

三 “使华录”的研究现状及突破口

如前所述,目前在国内外,对“使华录”的研究方兴未艾。不少从事哲学、历史学、文学乃至政治学、经济学研究的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到这项十分庞大的研究工程中来,并取得了不少喜人的研究成果。目前学界研究“使华录”的学术成果可以归结为如下几方面。

1. 具体研究某一作家的单一“使华录”作品,从而揭示出某种文化现象。譬如,[韩]李京子的《〈老稼斋燕行日记〉小考》(《汉城语文学》第3辑,首尔大学校国语国文学科,1984年),[韩]金明昊的《〈热河日记〉研究》(创作与批评社,1990年),[韩]朴智鲜的《探析金景善的〈燕轶直指〉》(《韩国文学论丛》,韩国文学会,1995年12月),[韩]孙承哲的《论〈北学议〉“尊周论”的特性》(《人文学研究》第17辑,江原大学校,1982年12月),金柄珉的《〈热河日记〉与中国文化》(《朝鲜—韩国学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韩]朴文烈的《青庄馆李德懋的〈入燕记〉研究》(《国际文化研究》,庆州大学校国际问题研究所,1996年)等。以上论著或论文,都是有关学者从各自学科的研究视角出发,不断挖掘“使华录”文本而取得的颇具学科性的研究成果,如果缺少这些研究成果的支撑,也就谈不上其它更复杂、更深入的学术研究。

2. 综合多部“使华录”作品,力求挖掘某些中国社会的文化特质。譬如,[韩]李元淳的《试论赴燕使团的经贸活动》(《历史教育》7,历史教育研究会,1963年),[韩]苏在英的《燕行的山河与燕行使的历史意

识》(《东洋学》第35辑,2004年2月,檀国大学校东洋学研究所),杨雨蕾的《朝鲜〈燕行录〉所记的北京琉璃厂》(《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12月),祁庆富等人的《清代朝鲜使臣与圆明园》(《清史研究》2005年第3期),张婷婷的《明代朝鲜朝贡路线的演变》(《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韩]林基中的《水路燕行录与水路燕行图》(《韩国语言文学研究》43,韩国语言文学研究学会2004年8月),[韩]李钟一的《朝鲜后期士大夫阶层的社会意识——以〈燕行录〉与〈海行总载〉为中心》(清北大学1992年博士学位论文),陈尚胜等的《朝鲜王朝对华观的演变》(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韩]崔承现的《19、20世纪之交的韩国人的中国观》(北京大学《韩国学论文集》第9辑)等。以上对“使华录”的研究成果,有一些是对某一学科领域有关“使华录”的总括性的理论阐述,有一些是对使华路径的实证考察,更有一些是归纳分析了朝鲜人中国观的演变过程。这些研究成果都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使华录”学术研究的领域,已经开始通过实证分析纵向归纳出“使华录”中颇具本质性的特征,从而为全方位、多学科地综合研究“使华录”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3. 开始有一些研究者从比较文学的视角对“使华录”进行了跨学科、跨文化的理论阐述,分析了朝鲜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以及朝鲜人中国观的演变过程。譬如,[韩]全美子的《18世纪韩国游记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以三种“燕行录”为中心》(北京大学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刘广铭的《朝鲜朝语境中的满洲族形象研究——以十七、十八世纪的使行文学为中心》(延边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李炫植的《燕岩朴趾源文学中的伯夷、叔齐形象研究》(《东方学志》2004年)等。这些著述主要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等研究方法剖析了清代中国的文学形象,这是一种比较大胆的有关比较文学研究的尝试,它将研究的基点放在了“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互动关系及其各种变化形式之上,而且对构成“他者”形象的“社会集体想象物”有了基本的把握与阐释。

根据以上的研究实绩及其存在的问题,笔者拟在这部著述中,在以下几方面有所突破:

(1)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都是以一至两三部作品为中心进行“使华录”的学术研究,所以尚未开展着眼于众多《燕行录》、《朝天录》作品,整个文化语境与主要文化类别的系统研究。基于这一点,在此

书中,笔者拟以朝鲜朝时代多部主要的《燕行录》、《朝天录》作品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分多种文化因子(人物、风俗、建筑、市肆、服饰等),对“使华录”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从而较全面地展现朝鲜朝使臣眼中的明代、清代的中國形象,进一步拓宽中朝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域。

(2)本著述将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始终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方法,着重从域外视角反观中国文化,具体考察朝鲜士大夫看待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特殊视角、价值取向以及朝鲜民族对中国的总体想象,从而拓宽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视野,藉此探究“他者”总体想象的成因与发展途径,真正体察“他者”与文本记录者及其记录后果之间的互动认知的辩证关系,剖析朝鲜朝文人眼中明代、清代中国形象的嬗变过程及其内在动因,从而使本课题的研究具有崭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

(3)本著述还将涉及到中朝两国的文化交流关系。朝鲜朝语境中的明代、清代中国形象是建立在中朝两国各个层面的交流基础之上的,《燕行录》、《朝天录》以及朝鲜文献中有关中国的描述,与中朝两国各个时期的历史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从这种意义上看,朝鲜朝语境中的明代、清代中国形象的演变过程,其实也是这一时期中朝两国关系或曰中朝两国文化交流关系的一部分。但是,与传统的以经典文献为基础延续的中朝文化交流史不同,《燕行录》、《朝天录》所构筑的文化交流史是指包括日常生活层面在内的两国的文化交流史。所以,本著述还要研究朝鲜朝文人的入华文化交流活动是如何调整与更新其内部传统的文化意识,并使他们的近代意识更加强烈、更加符合时代要求的。

第一章 朝鲜朝使臣的人华使行活动

第一节 朝鲜朝对明、清两朝的朝贡

既然《朝天录》、《燕行录》(也可统称为“使华录”)主要是指在中国的明、清两个朝代(历时 500 多年)来到中国京城的朝鲜使臣将其在华期间的见闻、感悟自由地有创意地记录下来的使行作品,那么,我们就有必要首先了解一下朝鲜朝对明、清两朝的朝贡活动情况。

中朝两国是具有悠久的特殊传统关系的国家。这种传统关系的特殊性表现为两国间保持着古代东亚世界特有的宗藩国际关系。尽管国家间的宗藩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国际关系,但在古代社会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因为源自中国儒家的礼治文化传统一直是建立并继续中朝两国宗藩关系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而共同的儒家礼治文化背景是自古以来两国保持这种特殊关系的奥秘所在。

古代中朝关系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以朝贡制度为媒介,而明清时期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转型期,与朝鲜朝的封建宗藩关系得到空前强化,并由此形成典型而实质的朝贡关系。不论是以华夏正统自居的朱明政权,还是以“夷狄”身份入主中原的清王朝,都把这种朝贡制度看作是一种怀柔 and 羁縻朝鲜人的重要手段。

可以说,这种朝贡制度的主要特征是朝鲜朝向明朝、清朝称臣,定期遣使朝贡,采用明朝、清朝的年号与年历等;明朝、清朝政府则对朝鲜国王予以册封、赏赐,对其贡物进行回赐等。这种典型而实质的朝贡关系具有较强的政治隶属性,它是封建君臣主从关系在对外关系上的延伸和宗藩关系的具体体现。以明代的情形而论,明朝政府多以发布谕令、遣使责问、“却贡”等方式,对朝鲜在王位继立过程中出现的篡

逆现象及其不守华夏礼节等问题进行劝诫或惩罚,而不是采取粗暴地干涉其内政的方式。

一 朝鲜朝对明朝的朝贡

就朝鲜王朝来讲,终明一代,朝鲜不论是在册封国王、世子、王妃的关键时刻,还是在确定有关国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大政方针的重要关头,都要派遣使臣来到明朝,以得到宗主国的册封和认可。正因如此,朝鲜几乎每年都要派遣几批使臣来到明朝。其实,明朝政府对于朝鲜的贡使是发布过敕谕的,即实行“三年一聘之礼”。而朝鲜为了尊重宗主国,同时也为了借此机会学习中国的各项礼仪制度,总是非常积极、频繁地遣使,即,朝鲜坚持年年朝贡,少则一年一次,多则一年三、四次。整个明代,朝鲜朝使臣出使中国的次数较为频繁,有时,一起使臣还未回国,另一起使臣却已从国内出发。道途之中,使臣队伍前后相望,常常是几起使臣相向而遇,或因出使目的不同而同宿北京玉河馆内。据《明仁宗实录》和《明宣宗实录》统计,洪熙、宣德年间(1425—1435年),朝鲜朝总共朝贡67次,平均每年达6次之多。据不完全统计,在明代的277年中,朝鲜朝使臣出使中国共计1252次^①,平均每年出使4.6次。朝鲜朝使臣出使次数最多的时期,是明朝初期的洪武和永乐时期,从朝鲜王朝这方面看,则是太宗国王和世宗国王时期。此后,朝鲜朝对华朝贡的次数略有减少,但一般不少于一年三贡。明朝晚期,曾令朝鲜一年两贡。崇祯二年(1629),又改“每岁两贡为一贡”^②。

朝鲜王朝初期入明使节统计表^③

朝鲜国王	太祖王	定宗王	太宗王	世宗王	共计
在位年	7	2	18	32	59
遣使次数	56	8	137	198	399
平均每年遣使次数	8	4	7.6	6.4	6.7 强

①根据《明实录》、《高丽史》和《李朝实录》等书中的相关资料整理、统计得出。

②《明史》卷三二〇,《外国传一·朝鲜传》,第86306页。

③据杨昭全、韩俊光所著《中朝关系简史》第228页《李朝初年使明一览表》改编,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

朝鲜是向明朝朝贡最为频繁的国家,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朝鲜对明朝的事大至诚。藩属国向宗主国称臣纳贡是一项最重要的义务,也是维系双方正常关系最重要的标志,其政治意义应是第一位的,但是,这种独具特色的国际交往,又同彼此之间的经济交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进贡为双方的政治关系提供了物质条件,并以此带动了整个贸易关系的健康发展。

明朝在制定和推行对外政策时,也从来都优先考虑朝鲜,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外交重点。在明朝统治中国时期,辽东一带始终都是不太稳定的地区。在明朝初年,因为北元的存在,导致明朝与高丽的外交出现波折;而在明朝中晚期,随着女真族的崛起,使得明朝较难在这一地区行使其统治权。因此,一个稳定而友好的朝鲜,对于明王朝维护其对东北地区的统治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明朝也经常派遣使臣出使或者回访朝鲜。对于朝鲜充满诚意的朝贡,明政府往往都是“加厚礼以送”,给予非常优厚的回赐。

二 朝鲜朝对清朝的朝贡

清代的中朝关系,在大部分时间里也延续了明代中朝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1637年2月,朝鲜朝与清朝签订了“丁丑约条”。同年4月,朝鲜王朝派遣谢恩使前往沈阳,这是朝鲜朝在新的中朝宗藩关系架构下派往清朝的第一支使团。派遣使团本身,对于承认朝鲜朝政权的合法性,对于保持中国的大一统的礼治并且维持中朝两国关系的稳定,都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清代的中朝关系,从17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了稳定、发展的时期,这种关系,不仅基本上沿袭明朝,还比明朝更为正常化、制度化。朝鲜使团在清朝的待遇要比明朝高。这表现在:一是,朝鲜使臣在中国朝堂上的班行、座次比前朝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即位居亲王以下、各国使臣之上。二是,明朝严格限制外国使臣在北京的驻留期限,只有40天,而清朝则无时间上的限制,一般可以驻留60天左右,而且还有更多的行动自由;除公事外,朝鲜使臣还可以以私人的身份接触中国官员、学者,浏览书肆及名胜古迹。^① 他们在北京参加重大的庆典,能

^①参阅蒋非非、王小甫等著:《中韩关系史》(古代卷),第32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

经常得到皇帝的接见、赐宴、赐酒,视同内臣,这是其他外国使团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朝鲜使团来到清朝的次数,也居于各国之冠。中朝两国使行的频率,也正显示着中朝两国关系的亲密程度。

随着清朝与朝鲜朝在政治上宗藩关系的建立与巩固,藩国的朝贡与宗主国的回赐也变得异常频繁起来。当时,在中国与朝鲜这两个相互“闭关锁国”的国度里,相互派遣使团才是沟通双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唯一管道。通过使臣交往的便利条件,中朝两国使臣可以顺便从事贸易活动,即相互交易各自需要的大量的物质与文化商品。确切地说,在顺治十五年(1658)以前,这种使臣贸易是双方的,既有朝鲜燕行使臣的贸易,也有清朝赴朝使节和得到允许从事对朝贸易的满清八旗人员到朝鲜国都的贸易。此后的使行贸易主要是指朝鲜使臣的燕行贸易^①。

清朝朝鲜使臣的燕行贸易共分三种:会同馆贸易、团练使后市和栅门后市。会同馆贸易是指朝鲜使臣到达北京后,在清朝礼部主客司会同馆的客舍从事的贸易;团练使后市是指朝鲜团练使及其属下在牛庄或沈阳将贡献清朝的岁币方物交卸完成后顺便从事的一种贸易;栅门后市则是指朝鲜使团差官往来中国时在栅门从事的贸易^②。由于团练使后市和栅门后市不是双方政府正式承认的贸易,所以被称作“后市”。^③

第二节 朝鲜朝使团的概况

一 朝鲜朝使团的类别

朝鲜朝使团出使中国明朝的缘由大致可分为贺、谢、请、献、奏、慰、告、其它等8大类35小项目。在总的8大类中,贺类的数量最多,有637个行次;其次是谢类,共有233个行次。献类中有155个行次,

①所谓燕行贸易,是指朝鲜使臣在清朝国都和赴清与回国途中所从事的贸易,朝鲜人称使清为燕行,即进入燕地。这种贸易到清末为止都很活跃。

②栅门,中朝两国边境的关门,位于凤凰城附近。

③参阅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史》(9),第320~321页。

这 155 个行次是指朝鲜使臣专程为贡献而出使中国的。^① 别的类别的行次数量较少,如,奏类 87 个行次,慰类 69 个行次,请类 44 个行次。其它类 20 个行次,告类 19 个行次。贺类又可分为贺万寿节、千秋节、正旦节、贞祥、登极、尊谥礼、册立皇子、平夏平胡、持皇子诞生及其它等 10 个小项目。在此,其它项目包括:(1)贺永乐皇帝巡幸北京,(2)贺新建奉天、谨身、华盖三大殿成,(3)贺太庙礼成,等等。在贺类中,贺正旦节、冬至节最多,共有 239 个行次;其次是贺万寿节,有 227 个行次。由于每次遣使的目的不尽相同,所以,朝鲜派出的使团也是名目繁多,有贺正使、贺节使、谢恩使、谢浩命使、问安使、计禀使、进香使、陈慰使,如此等等。朝鲜使团的规模往往因出使的目的不同而不同,少则几人,多则几百人。

朝鲜派往清朝的使行有固定与不固定两种:前者包括“节使”和皇历赉咨官使行,都是在固定的时间、以比较固定的规模派往北京,也进行相对固定的使命。一般来说,朝鲜朝“每岁圣节(即皇帝生日)、正旦(嘉靖十四年,即 1531 年。以后改为冬至)、皇太子千秋节(即皇太子生日),皆遣使奉表朝贡”^②。后者又称为“别使”,是朝鲜朝方面为完成一项或几项使命而临时派出的使团,其种类较多,主要有谢恩使(赏赐、册封、颁诏)、进贺使(登极、尊号、尊谥、册立皇太子、讨伐农民起义或贵族叛乱)、陈奏奏请使(押送牛马、遣返人员、告讞、请谥)、陈慰进香使(哀礼、宫中失火)、问安使等,从而加强同明朝、清朝的联系。据统计,在清代从 1637 年(崇德二年)到 1894 年(光绪二十年)的 258 年间,入燕使行共 694 次,年平均 2.69 次。^③ 具体而言,其主要使节为^④:

1. 节使

其全称为“进贺冬至、正朝、万寿三大节兼岁币使”,它实际上执行

①实际上,朝鲜使臣就其它缘由如贺万寿节、千秋节、正旦节而来到中国时,也均有贡品。后来朝鲜使臣在上奏时也带有贡品,但这些并未包括在献类中。

②林尧俞、俞汝辑:《礼部志稿》卷三五。

③全海宗:《清代韩中朝贡关系考》,表 2,《中韩关系史论集》,第 194 页。

④参阅刘为所著《清代中朝使者往来研究》,第 29 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 年 8 月。

了四种使命,其最重要的一种是“兼使”。

在明代至清顺治朝之前,这四种使行通常是分开进行的。进贺皇帝寿辰为圣节使;正朝使则在每年正月表贺元旦,并随班于大朝觐见皇帝;冬至使进贺冬至节;岁币使进献每年例贡。在有明一代,例行的贡赐一年仅有正朝、节日、千秋、冬至等四次。其中,“正朝”原来是指诸侯或属国于岁首(正月初一)朝见天子并贡献方物。这一礼节有悠久的历史,就属国朝见天子来说,乃是最重要的一次礼仪活动。一年之始,送旧迎新,天子同国内外臣子共聚一堂,同庆佳节。此时,属国使臣要向天子进献表文和方物,天子要向属国颁发新年历法,回赐礼物。朝鲜朝派往大明祝贺元旦的使节称为“正朝使”。所谓“节日”是指皇帝的生日,此礼仪始于唐代。唐玄宗的诞辰为唐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八月初五日,开元十七年(729)百官请以是日为“千秋节”^①,天宝七年(748)改为“天长节”。自此以后,凡皇帝生日,或定节名(如庆成节、万寿节等^②)或不定节名,皆称为“圣节”。

现将明代皇帝(前十二代)生日列表如下,以供参考:

皇帝姓名	生日	皇帝姓名	生日
(一)太祖朱元璋	九月丁丑	(七)代宗朱祁钰	八月壬午
(二)惠帝朱允炆	十一月己卯	(八)宪宗朱见深	十一月庚寅
(三)成祖朱棣	四月癸酉	(九)孝宗朱祐楹	七月己卯
(四)仁宗朱高炽	七月辛未	(十)武宗朱厚照	九月丁酉
(五)宣宗朱瞻基	二月甲辰	(十一)世宗朱厚熜	八月辛巳
(六)英宗朱祁镇	十一月己未	(十二)穆宗朱载垕	正月癸卯

关于“常贡(常献)”所献纳的物品,则有“金银器皿、螺钿梳函、白绵绉、各色苧布、龙文帘席、各色细节席、豹皮、獭皮、黄毛笔、白绵、人参”等。^③关于黄金和白银的进贡数量,每岁分别定为一百五十两、七百两。^④种马三年一贡,每次五十匹,其品种也有定例:“乌嘴、乌肾、

①“千秋节”是指皇太子的生日,朝鲜派“千秋使”祝贺,“冬至”则派“冬至使”祝贺。

②明代称皇帝的生日为万寿圣节,朝鲜派“节日使”(圣节使)进献方物。

③《明会典》卷一七。

④《李朝太宗实录》十七年八月条。